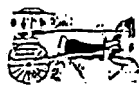


1700 中國二百年



從馬戛爾尼訪華
到鄧小平南巡

李守中 / 著



實用歷史叢書

1793-1992

從馬戛爾尼訪華到鄧小平南巡

中國二百年

1793-1992

中國二百年——從馬戛爾尼訪華到鄧小平南巡

作 者——李守中

主 編——游奇惠

責任編輯——陳穗錚

發 行 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084南昌路2段81號6樓

電話／2392-6899 傳真／2392-6658

郵撥／0189456-1

法律顧問——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2010年4月1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新台幣 38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32-6620-4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出版緣起

王榮文

· 歷史就是大個案

《實用歷史叢書》的基本概念，就是想把人類歷史當做一個（或無數個）大個案來看待。

本來，「個案研究方法」的精神，正是因為相信「智慧不可歸納條陳」，所以要學習者親自接近事實，自行尋找「經驗的教訓」。

經驗到底是教訓還是限制？歷史究竟是啟蒙還是成見？——或者說，歷史經驗有什麼用？不可用？——一直也就是聚訟紛紜的大疑問，但在我們的「個案」概念下，叢書名稱中的「歷史」，與蘭克（Ranké）名言「歷史學家除了描寫事實『一如其發生之情況』外，再無其他目標」中所指的史學研究活動，大抵是不相涉的。在這裡，我們更接近於把歷史當做人間社會情境體悟的材料，或者說，我們把歷史（或某一組歷史陳述）當做「媒介」。

·從過去了解現在

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我們對一切歷史情境（milieu）感到好奇，我們想浸淫在某個時代的思考環境來體會另一個人的限制與突破，因而對現時世界有一種新的想像。

通過了解歷史人物的處境與方案，我們找到了另一種智力上的樂趣，也許化做通俗的例子我們可以問：「如果拿破崙擔任遠東百貨公司總經理，他會怎麼做？」或「如果諸葛亮主持自立報系，他會和兩大報紙持哪一種和與戰的關係？」

從過去了解現在，我們並不真正尋找「重複的歷史」，我們也不尋找絕對的或相對的情境近似性。「歷史個案」的概念，比較接近情境的演練，因為一個成熟的思考者預先暴露在眾多的「經驗」裡，自行發展出一組對應的策略，因而就有了「教育」的功能。

·從現在了解過去

就像費夫爾（L. Febvre）說的，歷史其實是根據活人的需要向死人索求答案，在歷史理解中，現在與過去一向是糾纏不清的。

在這一圈圍城之日，史家陳寅恪在倉皇逃死之際，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抱持誦讀，讀到汴京圍困屈降諸卷，淪城之日，謠言與烽火同時流竄；陳氏取當日身歷目睹之事與史實印證，不覺汗流浹背，覺得生平讀史從無如此親切有味之快感。

觀察並分析我們「現在的景觀」，正是提供我們一種了解過去的視野。歷史做為一種智性活動，也在這裡得到新的可能和活力。

如果我們在新的現時經驗中，取得新的了解過去的基礎，像一位作家寫《商用廿五史》，用企業組織的經驗，重新理解每一個朝代「經營組織」（即朝廷）的任務、使命、環境與對策，竟然就呈現一個新的景觀，證明這條路另有強大的生命力。

我們刻意選擇了《實用歷史叢書》的路，正是因為我們感覺到它的潛力。我們知道，標新並不見得有力量，然而立異卻不見得沒收穫；刻意塑造一個「求異」之路，就是想移動認知的軸心，給我們自己一些異端的空間，因而使歷史閱讀活動增添了親切的、活潑的、趣味的、致用的「新歷史之旅」。

你是一個歷史的嗜讀者或思索者嗎？你是一位專業的或業餘的歷史家嗎？你願意給自己一個偏離正軌的樂趣嗎？請走入這個叢書開放的大門。

自序

這本《中國二百年》記述了自一七九三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至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這二百年間在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是從我那一大堆雜亂的讀史筆記裡整理出來的，談不上系統和全面，只是把我認為有興趣的一些題材按時序編排起來而已，儘管如此，從我一開始動筆之時就意識到這可不是件輕鬆的事情，沒有決心是不可能完成的。

促使我下決心動筆的原因固然有多起，不過對我最大的激勵還是起於一樁偶然的事。

幾年前，我正在一處書攤上翻看一本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書，恰好被一位朋友看到了，他很以為然的搖著頭說：「這些事情是弄不清楚的！你一個說法，他一個說法，今天一個說法，明天又是一個說法……」。我不得不承認，朋友的議論確實很有道理，他所談到的「說法」包含著兩層含義，一是指事件的真相，二是指對事件的理解。

不過我仔細一想，比較一下這些不同說法，而後記錄下自己的判斷和見解，不是也很有趣

麼？

早就有人評論說：讀中國的報導有如看日本電影《羅生門》，那部電影中的四個人，強盜、武士、武士之妻和一位樵夫，他們對一樁命案有五種不同說法，電影似乎沒有強迫觀眾去採信某一個說法，觀眾可以自由選擇答案。自由選擇就是樂趣。

讀書人不是可以從讀書中享受這樣的樂趣麼？

不過我這裡所說的讀書人不包括下列兩類人。

第一類是在校的莘莘學子，他們首先要應付考試，所以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致去比較那些不同說法，他們只能勉強記住教科書或者教師講授的說法，而後在試卷上複述這些說法，考完之後也就儘快把它們送進回收站，以便讓出容量來應付新一輪輸入。

記得五十年前筆者就讀於重慶大學礦冶系之時，有一門必修的政治課稱為《聯共（布）黨史》，各系同年級的學生在一起聽大課，課後分組討論，然後各班課代表向教研室會報討論結果，其實這些討論也不過就是複述聽講內容而已，但是有一次我們班上的一位同學卻提出一個小的問題，問題的內容我早已忘記了，只是記住了後面發生的事，幾天後，課代表傳達了教研室的答覆：《聯共（布）黨史》是經典性著作，必須嚴肅對待，不允許懷疑，也不允許不同的理解。

試問，如此讀書還有什麼樂趣可言？好在，從來也沒人指望在這類讀書中尋找樂趣，最近我倒只是想查一下那本書中的一些說法，可惜在任一處圖書館裡都不見該經典的蹤影了。

第二類讀書人也不在我所說的範圍之內，他們是專業治史者，專家讀史應該不同於一般讀書人。

一般讀書人以「書」為限，他們能接觸到的不外是書店和公共圖書館內書刊，最多再佐以自己的見聞。他們只能從這些資料中選擇自己的判斷和得出自己的見解。在這一點上他們與電影《羅生門》的普通觀眾沒有多少區別。

專家則不應如此，他們必須去挖掘一切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論點，正如一位刑事偵察專家研究一樁謀殺案那樣。他們研究《羅生門》的方式絕不會與普通觀眾相同。

讓我來舉一個例子，上世紀六〇年代，戚本禹與羅爾綱就李秀成投降案辯論，戚本禹遍查清廷軍機處檔案，終於找到了有利於自己的證據，這樣的專業性研究確實必不可少，不過這不是一般讀書人能夠從事的工作。

中國近代史料浩繁，一般公共圖書館內的史料已經令人無暇遍讀，更何況還有許多重要史料尚深藏於臺北、北京、東京、莫斯科、倫敦和華盛頓等地檔案館內，就算這些檔案允許公眾自由查閱，恐怕一般讀書人也難以問津。

所以我們一般的讀書人也只能就自己身邊可用的資料來分析對比，來尋找讀書的樂趣。就筆者而言，他的閱讀範圍就以昆明市各圖書館藏書和市面售書為限。

筆者發現，僅自己所接觸的這些史料，也有如朋友所說：「你一個說法，他一個說法，今天一個說法，明天又是一個說法」。其實這正是一個正常而合理的現象，法庭上控辯雙方的法律專

家不也是各執一詞以供陪審團及審判長兼聽及選擇麼？

筆者還發現，在圖書館的許多書籍上都留下了讀者的批語，他們用這種方式向作者發出疑問或者批駁，也向其他讀者交流見解。從道理上說，讀者有權評論這些書刊，不過，在公共圖書上去塗寫畢竟不是很妥善的作法。

感謝臺北的遠流出版公司為我出版此書，使我不必在公共圖書上去亂畫了。

李守中 二〇〇三年五月於昆明

目錄

□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

□ 自序

1. 預警	3
2. 馬戛爾尼使團	9
3. 鴉片戰爭	17
4. 太平天國	33
5. 英法聯軍	44
6. 自強	53
7. 廠礦·鐵路·學堂	63
8. 中興	71
9. 明治維新	80
10. 甲午之戰	97
11. 百日維新	105
12. 義和團	114

29. 南京中央政府	331
28. 北伐	305
27. 北京執政府	295
26. 中山艦	284
25. 五月三十日	279
24. 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	266
23. 孫中山和廣州政府	243
22. 直系和北京政府	230
21. 五月四日	219
20. 參戰	205
19. 帝制失敗	188
18. 妥協	180
17. 民國成立	166
16. 保路風潮	160
15. 憲政危機	156
14. 同盟會	149
13. 加快變革	134

□ 後記

532

41. 大趨勢

528

40. 新思維

510

39. 改革

500

38. 史無前例

461

37. 北京與莫斯科之爭

454

36. 改造

425

35. 臺海分隔

420

34. 抗日

395

33. 團結

374

32. 紅軍大轉移

364

31. 民族危機

351

30. 中華蘇維埃

340

中國二百年

從馬戛爾尼訪華
到鄧小平南巡

李守中／著



1. 預警

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康熙大帝在與大學士們論及東南沿海外洋事務時說了一句話：

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這句話在當時並沒有引起多少重視，在其後的一百餘年裡也沒有人注意，今天恐怕已經很少有人知道這段警告了。

這也難怪，畢竟預言的是「千百年後」的事，當時以及其後的朝廷都有一大堆急迫的事等候處理，有誰去為千百年之後的事操心？

康熙的警告並非信口而發，他從欽天監內的爭論以及西洋教士為他測繪地圖的工作裡，看出西洋等國在天文、數學、航海、測量、機械等方面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國。

他還知道俄羅斯的炮術也遠遠超過了中國，而俄羅斯與西洋各國相比還是個落後國家。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1672-1725) 正在力圖改變這個狀況。

不過西洋各國畢竟還是極其遙遠的國度，他們遠涉重洋來到中國的目的不外是為了通商和傳教，這些都是可以恩准的，因為通商就是進貢，這就是揚天朝威名於海外，而外國傳教士們除了傳教之外，還帶給他許多新知識，他在與俄羅斯使臣的交往中就利用了這些知識，傳教士們還在中俄談判中擔任中方譯員。

康熙知道這一切，他還知道中國的土地、人口以及財富都遠遠超過那些西洋國家，所以在「千百年之內」，那些遙遠的國家還不至於危害中國，這是他的預言；也是他的判斷。如果不是因為歐洲後來發生了工業革命這個意外情況，康熙的這個判斷也許還算不錯。

清初來華的西洋教士與明末來華的西洋教士有很大區別，儘管他們都是飽學之士，但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如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湯若望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鄧玉函 (Johann Schreck, 1576-1630) 等人特別注意結交中國的士大夫，這些士大夫就是當時的高級知識分子，如徐光啟 (上海徐家匯就是他的家族居地)、李之藻等人，於是中國就出現了一批掌握歐洲知識的士人，而當時的皇帝並不重視這些傳教士，所以也極少接觸他們。到了清初，皇帝開始重視這些傳教士，聘請他們為私人數學教師和顧問。於是他們就把全部精力放在皇帝身上，不再注意士大夫們了。而士大夫們也非常敵視傳教士，沒有人願意結交外國人，更不願學習他們的知識，這些知識對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毫無用處。對做官更